

张鸣精选集

再说戊戌变法

张鸣
著





张鸣
精选集

再说戊戌变法

张鸣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说戊戌变法 / 张鸣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403-0

I. 再… II. 张… III. 戊戌变法—研究 IV. K25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8102 号

再说戊戌变法

编 著 者 张 鸣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9.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403-0

定 价 29.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入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

看来,现在的企业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

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生导师程歆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

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前 言

百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久远的时间区限,讳言说死,而称“百年之后”,祝愿婚姻久长说“百年好合”。百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活不到的年限,所谓“人生不满百”,“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百年也就成了时间久远的代名词。一件事情过了一百年,即使在节奏很慢的古代,也算是有历史的了,而一个事件过了一百年还会让人想起它,仅仅这年限就足以证明这个事件意义不同寻常。

戊戌维新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很难忘怀的历史事件。没有打打杀杀的喧嚣,也没有应者云集的声势,但是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却是居于前列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面临最严峻也最迫切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就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戊戌维新恰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记得中国现代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的路虽然很漫长,但要紧处就是那么几步。其实,国家和民族也类似之。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民族与国家也是一样,只不过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要远比个人历史长,所以还有机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加以弥补,当然,这得花费几倍的努力才行。

从表面上看,戊戌维新只是少数先进的士人仓促登台又仓促被撵下台的政治表演。但就是这短短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国家的旗帜上写下了向西方学习,全面变革的口号。从1840年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学说与见解,从来只是汉学、宋学的异音杂说,西学只有拾遗补缺的位置,经过维新运动一千人的奔走呼号,原来的潜流变成了浪花四溅的大波,从此以后,中国的学术大变,学风大变,思潮也大变。不仅抱残守缺的旧学黯然失色,就是“中学西源”这样的托词也没有了市场,虽然戊戌政变后的短暂的黑暗一时似乎像是要使河水倒流,但潮流毕竟还是向前涌进了。

戊戌维新是一次不成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虽然人们嘴上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毕竟更偏爱成功者的辉煌和欣赏凯歌行进的飞扬。不过对于想从历史中寻求教益者,失败者的足迹也许更有研究的价值。戊戌维新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在于它的失败。

戊戌维新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惋惜和伤感,由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自体性变革,这种变革对近代化进程而言,代价最小,震动最小,落后国家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近代化,尽管有“不彻底”和“改良主义”之消,还是很合算的。然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幸运,变法很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的种种举措,它的过程细节,都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毕竟,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完全程,当我们举目四望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我们走过的路程并不太长,不仅没有值得夸耀的资本,反而需要更高明的策略和更大的勇气,好让我们能走得更快一点。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今天的改革的性质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已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在当年改革者的足迹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不少教益。比较起来,近代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没有像戊戌事件那样离我们今天的事业那样近。

史学界关于戊戌的著述已经很多了,在此,我不想再次描述戊戌变法的过程,重申已经让人说得絮烦的老调,只是想从政治制度、现象和轨迹中,寻出几丝新意,如果寻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还值得一读,那么吾愿足矣。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2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4

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11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19

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28

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35

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40

甲午前多数士林的躁动与迷惘/46

第三章 梦醒时分的政治动作与趋向

甲午震动,大变端倪/55

学习日本,东学之渐/61

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66

大梦之后的多数士林:无歧困羊/70

第四章 变法的政治曲线

变法的政治动员/74

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82

启蒙与变政/95

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111

第五章 维新的陷阱

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122

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131

帝党与后党的界限/135

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 139

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 145

第六章 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资历问题 / 152

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 156

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 161

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 168

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 178

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 183

明定国是的风波 / 188

健言之臣，顾问之功 / 194

替代：四小军机 / 199

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 205

权杖下的政变 / 212

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进化论与张三世 / 223

“物竞天择”与开民智 / 226

绅权与民权 / 230

议员和议郎 / 236

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 241

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 / 247

第九章 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精简的沉滞 / 254

改革的次序 / 267

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 272

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 276

结语与余话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尽管清末以来，排满的革命家们将满人政权痛诋至一无是处，但平心而论，满清还是蛮有特色的一代王朝，远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实有凤鸭之别。究其由，并非清代制度比之明季有什么好处，而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两朝有很大的差别。清代之帝，不论贤与不肖，个个都有图治之心，说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从此不早朝”的事好像也没有。就更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自封“总兵”和明熹宗专事斧斤的胡闹帝王。更何况还出了两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称明君的康熙与乾隆，前后统治百多年。在人治政治模式的传统政治中，君主的明智与勤政显然比任何贤臣都更加有效。

虽然清朝政治颇有气象，但由于在制度上“清承明制”之故，几乎明代政治的明弊与隐疾，清代也都有，换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与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相权的皇权集权，以相互牵制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外轻内重的布局，地方的简政与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制等等大都大同而小异。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任何政治系统，只要能实现统治目标，就应该是合格的。自宋以降，在多数情形下中国封建统治者最关切的统治目标是对国家的控制，消解内部的叛离，至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则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家机器的腐败，往往能换取皇权的稳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看来的所谓政治系统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种统治所必需的合理代价。只是，这种代价在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会逐渐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损伤整个系统。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变，就是在这种代价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的刺激而发生的。政治重心由内重外轻转为外重内轻，新兴的湘淮军制部分弥补了传统兵制的怠滞，从而

使清代政治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虽不足以抗击西方的冲击，但已可延缓其寿命。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中国进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论，是进入了衰落期，统治方面无论是制度还是经验手段都过分地致密而烦琐，政治目标体系中保守主义倾向加重，过分地强调政治稳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可能的动荡乃至波动。相较而言，清代比明代这方面的特征更明显。

清季统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讲究“祖制”，或许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许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有谨慎，总而言之，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着近乎神圣的意味。日常事务，以循行祖制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于祖制则理直气壮，不合则躲躲闪闪，有时明明是新举措，也偏要打着祖制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变以后，西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訢联手，为了遮人耳目，混淆视听，故意给奕訢以实际上已经废置了一百多年的议政王称号，来陪衬她的“垂帘”，即让祖制上有的“议政王”掩着祖制上没有的“太后垂帘”。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还远远谈不上像我们一般作为常识公认的那样是僵化的，它在适应情势变化方面，还是具有弹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数时间里，能够应付统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补丁机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应付局面，或者为统治者所不喜时，用某种“补丁”政策和要素来修补之，并不去掉旧的。道光帝对此曾有段佳妙的议论，他说：“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1]这种“补丁机制”运行起来有两种情况，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补丁小，一种补丁大。不论补丁大小，要的就是补得“整齐”，面上光。

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财赋政策。清代中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军费开支陡增，囿于赋税不增的祖制，尽管军情火急绝没有人再敢在国家日常赋税上打主意，于是只好开捐，最后又加上

厘金征收,尽管捐额与厘金比例越来越大,但比起国家常税,它还是一种小补丁。又如总理衙门的设立,尽管不仅弥补了原政府机构欠缺的外交职能,而且凡有洋务之处,无不插手,事实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职权领域,但比起原来庞大的政府机构来,它承负的行政功能还是要少。

属于大补丁的情况相当多,像内阁之于议政处,军机处之于内阁,前者虽然没有撤销,但职能均为后者抽空,成为名副其实的“闲衙”。再有像以湘、淮军为首的勇营之于八旗与绿营,以及后来的新建陆军,递次相补,国家正规军的位置先是由勇营挤走了八旗绿营,而后新军又挤走了勇营,但直到清朝覆灭时,八旗与绿营仍在苟延残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实行低俸禄制,正七品的知县,年俸四十五两,四品知府一百零五两,巡抚与总督,贵为封疆大吏,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和一百八十两(乾隆时米价,每两不过买一石米多一点)。明知这点官俸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却不肯加增,开始默认官吏在耗羨上打主意,后来则添加高出俸禄百倍的养廉银。最典型的莫过于漕政,漕运在晚清由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河漕的一整套机构无事可做,但一直摆在那里,戊戌变法时好容易要撤了,没几天又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补丁有时已经大过了它所补的东西。事实上是听任原有的东西自我萎缩,自生自灭。

清代政治这种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虽然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部分需要,也确有减少政治震荡的好处,甚至面对西方的冲击,也能作出相应(虽然很笨拙)的反应。但是,修补一旦成为一种政治惯性或者传统,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为因循守旧提供堂而皇之的栖息地。当步入近代面临近代化和对付西方侵略这双重课题时,修补功能就愈发力不从心,机构的叠床架屋,政策的混乱重复,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随着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务的日重,这种修补政策实际上已经走上末路穷途。可惜的是长期的修补传统在人们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因循迟滞,得过且过的惯性,和对彻底变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补旧的操作定式。这样,人们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其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就显得格外的厚重。李鸿章在晚年曾不无自嘲地称自己是个于事无大补的裱糊匠。不错,李鸿章给清王朝这座风雨

飘摇的大厦裱上了淮军和北洋水师，裱上了洋务企业和几个半洋的学堂，可急风骤雨一来，依旧房倒屋坏，补丁毕竟只是补丁。

[1] 张集馨：《道成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第89页。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满人是统治民族，自然拥有不言而喻的地位和特权。清末的反清志士们，将满人对汉人的民族压迫渲染得非常吓人，其实“紂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满清入关之初，八旗铁骑横扫华夏之时，对汉人的杀戮、欺凌与压迫的确堪称是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之屠”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再加上圈地的豪夺，“逃人法”的暴虐，说是令人发指也并不过分。但是经过清代盛时长达百余年有意为之的文化融合与政治上的掩饰，满汉矛盾已经渐趋缓和，满人虽有特权，但活动却被尽可能地限制了，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与汉人生活隔离开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满人压迫的感觉并不那么直接，以清末刺杀五大臣而闻名的反清斗士吴樾，在自述中就承认他在接受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当然，说满人压迫“不若是之甚”，并不是说这种压迫不存在，终清之世，满人的特权和满汉在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终存在。而且尽管汉人参政的份额不断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中国政治的重心在满不在汉。只是当初赋予满人特权、给予满人种种优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种种给予在历史发展中反而成了满人的一种甜蜜的桎梏，不仅使他们在生活上丧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见其低能。

自从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编为四旗，而后是八旗以来，满人逐渐赢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称谓（也包含少部分汉军和蒙军旗人）。八旗制度从其主导方向说，应该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但这种制度绝非只有军事上的意义，前辈清史专家郑天挺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他说：“八旗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呢？有人认为八旗制度是军队制度，

实际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有人说是户籍制度,其实它也不单纯是户籍制度。因为它还有应尽的其他义务和应享的其他权利。可以说这是在民族联盟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梯统治,它是满人入关前的政治制度。”[1]应该说,八旗制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种媒介和渠道。由于八旗制度所特有的氏族残余性质的军事民主意味,旗下政治在满清未入关之前主要表现为旗下人较为普遍的议政与参政,在上层表现为八贝勒共议国政,连诸贝勒与汗(皇太极)相见之礼居然是他们“各至汗前,依次抱见”。[2]在中下层则表现为各旗内部的相对自治和甲喇、牛录及披甲人对各自事务的发言权。这在游牧、半游牧的氏族军事民主制度中是常见的情况(八旗是由原来极民主的穆昆塔坦制度发展而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从皇太极开始,清朝皇帝制度汉化的最大敌人,就是八旗的议政制度与传统。不言而喻,这场较量皇权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顺治应该说不算是位很热心汉化的皇帝,但突然发病身死的他,身后却冒出来一个痛悔自家“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3]即后悔汉化太快的“遗诏”。显然,这是满人元老意志的体现。实际上是旗下政治传统对制度汉化的反弹。康熙时,辅政大臣鳌拜在小皇帝面前还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鳌拜有不臣之心其实是后来的诛心之论,说穿了不过是满人军事民主传统的孑遗而已。直到雍正继位,满人入关已历半个世纪,他还接二连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应事务”,改八旗都统在“私家办事”为“俱于公所办事”。[4]并将八旗都统的印信“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这说明,直到这时,八旗各旗自治的遗风犹存。

当然,满清入关以后,旗下政治还是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八旗原有意义上的“议政”传统在帝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打击下的确逐渐消亡了,但旗人对国政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却没有也不可能消

失,用康熙的话来说,“满洲乃国家根本”,醉心集权的清初诸帝,一方面伸出拳去打击旗下政治对皇权的干预,一方面却又要将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势必要给旗人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在晚清之前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占据,纵然满缺和汉缺对等,比汉人少得多的满人显然机会要多得多。在没有相权的情况下,皇帝实际上是集帝相角色于一身,既然又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所以处理行政事务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书房和军机处),还要依靠有关人员的“议政”,遇有重大事项,不但要交各部议,而且还要征集督抚的意见。虽说这种“议政”与清初议政王大臣的议政有本质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种参政,甚至说参与决策的形式。在这种议政中,旗人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

旗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正式途径。私下议论、小道传播、暗中托请等非正式途径无疑也是旗人干政的又一法宝。这种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夹缠不清的舆论与托请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能令人小觑的。康熙曾斥责议政处说:“今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此皆会议处不加缜密、不严明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露。”[5]这种随意泄露机密,议论国事的现象,后来也免不了。乾嘉时,军机处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常有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6]。自恃有特权的旗人就更肆无忌惮,先是泄密,而后就是议论和托请、干请。如果“具题”之事不合祖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后续的活动也许就会更热闹些。

旗下政治在满清入关后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汉化进程而融入汉人政治传统之中,由于旗人隔离与半隔离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恃的政治特权,使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习惯,清初会议政务,“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后来隔离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即使与汉官交契融洽的满员,也仍旧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须遵循那个圈子的规矩和惯例。

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圈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对清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浮现出一幅手拎鸟笼,无事泡茶肆酒